

# 從「政黨變革」理論分析 國民黨敗選與改革困境

關仲然

2024年台灣大選落幕，民主進步黨的賴清德以40%選票贏下選舉；同時舉行的立法院選舉，兩大政黨——中國國民黨和民進黨都無法取得過半數議席，而柯文哲創立的台灣民眾黨成為立法院的關鍵少數，兩大政黨都必須通過與民眾黨的合作，始能取得立法院的控制權。這屆選舉的結果，無論是對未來四年的台灣本土政治，以至小島以外的兩岸關係和中美關係，都有直接的影響。本土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的關係從來都密不可分，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台灣：哪個政黨執政，本來就代表既定的兩岸立場，自然也影響政府施政和對外關係。

在2016和2020年的兩屆大選中，民進黨都以大比數勝出。在兩黨制的台灣政黨政治之下，民進黨和國民黨以往一直處於此消彼長的狀態。但在今屆選舉中民進黨流失不少選票的同時，國民黨卻並未因此收復失地，選票由主打「第三勢力」的民眾黨所吸收。本文將討論的焦點放在國民黨上，並借用政黨政治研究文獻中的「政黨變革」(party change)理論，分析國民黨在近年選舉失利的原因，主要在於兩岸議題的立場，包括對「九二共識」的堅持，無法取得中間選民的支持。在2020年的選舉大敗之後，國民黨曾經短暫出現調整兩岸政策和「九二共識」立場的聲音，但最後無疾而終。在「政黨變革」理論中，縱使政黨作為大型組織結構在本質上抗拒改變，但選舉落敗一直都是導致或迫使政黨作出改革的重大原因。然而，國民黨經歷接連的選舉失利，卻始終無法擺脫選舉頹勢，這代表國民黨的改革無效，還是因為它反其道而行，始終維持原狀，無論在組織架構或議題立場上都近乎沒有作出任何改革，以尋求改善選舉表現？

本文首先分析2016年以後的選舉結果(包括2018及2022年俗稱「九合一」的地方選舉)，比較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總體得票狀況；接着回顧有關「政黨變革」的文獻，以解釋選舉結果與政黨作出變革之間的關係，同時以民進黨在

2008年大選落敗之後的改革作為例子，顯示政黨變革的作用；然後探討國民黨在2016年大選以後的改革方向和嘗試；最後分析國民黨改革欠奉的原因及後果。

## 一 國民黨在2016年以後選舉中的結果分析

自2016年起，接連在大選中失利的國民黨始終無法走出低谷，在剛結束的2024年大選中，國民黨候選人侯友宜繼續落敗，這已經是該黨連續三屆落敗。當民進黨創造歷史、打破台灣民主化以後最多執政八年的宿命時，國民黨也一樣創造歷史，首次超過八年在台灣無法執政。本屆大選本來是國民黨有可能重新執政的一次難得機會，但因為民眾黨的柯文哲決意參選，形成三位候選人共同競逐（台灣人稱為「三腳督」）的局面。跟2016和2020年大選中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不一樣，柯文哲始終在民意調查中保持競爭力，也曾經一度醞釀在野陣營的「藍白」合作——柯文哲雖然曾經和侯友宜協商共同出選而最終破局，但從柯文哲的從政生涯來看，他一直以來的票源偏向民進黨多於國民黨。柯文哲在2014年首次參選台北市長，當時獲得民進黨的背書支持，以57.15%得票率大勝國民黨的對手連勝文；到2018年他和民進黨不再合作，依然成功連任，而民進黨的姚文智得票則慘不忍睹，僅17.28%。雖說以上結果只局限於台北市，但對了解柯文哲支持者的分布仍有參考價值。柯文哲受年輕選民歡迎（從選前造勢晚會的實地觀察就可以確認），這本來也是民進黨相較於國民黨所擁有的優勢。因此，柯文哲在本屆參選對民進黨也會構成較大的競爭；反過來說，國民黨在民眾黨加入戰團之後，或許有漁人得利的機會。

從這次大選結果來看，民進黨得票確實大幅度下降（從2020年的817萬票減少至558萬票），且幅度比國民黨大（從2020年的552萬票減少至467萬票），這一結果也間接支持了民眾黨的參選對國民黨有利的說法。國民黨與民進黨得票的差距，就從2020年相差超過260萬票，大幅收窄至這次的91萬票。台灣大選採取簡單多數制，候選人無需有過半數的得票才能當選，因此，本屆大選在民眾黨參選之下，國民黨有可能以低票數當選，只是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票數差距縱然已經收窄，仍然未足以讓國民黨重新執政。

另外，在2024年的立法委員選舉中，同樣在民眾黨的參選之下（並且從不分區立委選舉中取得8席），民進黨和國民黨都無法取得過半數議席，意味着沒有政黨能夠取得立法院的控制權，這也是自2008年立法院議席減半之後首次出現沒有政黨取得過半議席的一屆。國民黨在立委選舉中合共取得52席，比民進黨多一席，成為新一屆立法院的最大黨。從表面上看，這是國民黨得來不易的一場勝利，因為在過去兩屆選舉，國民黨都同時輸掉執政地位和立法院的控制權。然而，只需仔細地觀察得票數字，就可以看出這場「勝利」背後其實難掩國民黨在近年選舉的弱勢。在不分區立委選舉中，藍綠兩黨一樣

取得13席，但國民黨實際得票比民進黨少22萬票左右；至於區域立委（包括原住民議席）方面，國民黨取得39席，比民進黨要多一席，但實際得票比民進黨少近69萬票。台灣的區域立委以單議席單票制選出，而得票率與議席分布不成比例亦是相關選舉制度的特色。在國民黨慶祝成為立法院最大黨的同時，不能忽略該黨在得票上不及民進黨這個事實。

自馬英九卸任之後，國民黨的得票每況愈下，特別是在2016年以後始終無法在大選中取得超過40%的選票。表1整合了國民黨和民進黨2008年之後在大選及「九合一」地方選舉中的得票總數和得票率。兩黨在各屆選舉中的得票都有增減，但國民黨近年的總體表現，相比馬英九當選的2008及2012年，呈現了下滑的趨勢。國民黨在2018和2022年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中，得票都比兩年前的大選有所上升，但地方選舉的表現卻無法延續到下屆大選之中。另外，在2022年的地方選舉，國民黨的得票率達到50%，是2012年大選之後的首次，但投票率卻是近年台灣選舉中最低，這些都是不能忽視的因素。

表1 民進黨及國民黨在各場選舉中的得票總數（得票率），2008至2024年

	民進黨	國民黨	投票率
2008年大選	5,444,949 (42%)	7,659,014 (58%)	76%
2012年大選	6,093,578 (46%)	6,891,139 (52%)	74%
2014年「九合一」	5,830,106 (48%)	4,990,677 (41%)	68%
2016年大選	6,894,744 (56%)	3,813,365 (31%)	66%
2018年「九合一」	4,897,730 (39%)	6,102,876 (49%)	67%
2020年大選	8,170,231 (57%)	5,522,119 (39%)	75%
2022年「九合一」	4,743,468 (42%)	5,701,977 (50%)	60%
2024年大選	5,586,019 (40%)	4,671,021 (34%)	72%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中選會「選舉及公投資料庫」整理。

說明：(1)表格所列大選票數，不計立委選舉。(2)2018及2022年的「九合一」選舉，政黨所得票數是各直轄市及縣市長候選人的得票總和。(3)2014年的「九合一」選舉，是台灣立法院在2010年修訂通過《地方制度法》後，首次統一舉辦各項地方公職選舉。

## 二 民進黨在2008年大選落敗後的政黨變革

在政黨政治的研究中，其中一個重要課題是「政黨變革」。對於大型政黨來說，儘管作為大型組織機構的一種，本質上傾向保守和抗拒改變，但實際上政黨仍然會因應所面對的各種挑戰而作出改變，迎合社會時勢發展，從而保持競爭力<sup>①</sup>。當中最關鍵的一環，在於是否有「好的原因」(a good reason)或「刺激」(stimulus)去促使政黨作出改變<sup>②</sup>。論者指出，民主制度下的政黨主要有四大目標，包括：(1)獲取最多選票；(2)獲取最多議席；(3)黨內民主最大化；(4)政策倡議。當這些目標無法達成的時候，一個「好的原因」就會出現，因為政黨有需要通過改革來重新達到這些目標，尤其是贏取更多選票和議席<sup>③</sup>。

現實中，如果要具體解釋政黨怎樣偏離四大目標，最直接也最常見的一個原因就是被形容為「變革之母」(the mother of change)的選舉落敗；另外，當有新政黨成立，對現有政黨構成挑戰的時候，現有政黨就有需要作出改變來應對<sup>④</sup>。需特別強調的是，以上的政黨目標以及政黨變革的原因，主要適用於大型、針對不同選民的全民政黨(catch-all party)，而不完全適用於小型、針對特定群眾和議題的利基政黨(niche party)。因為大型主流政黨都以執政為首要目標，而小型政黨很多時候只以提倡特定議題為主要目標，兩者有所不同。

政黨變革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方向：(1)組織架構的轉變；(2)政綱或議題的轉變。有關組織架構的轉變，論者提出了合共二十六種可能，從政黨名稱、黨內的開會頻率到政黨的候選人選擇等<sup>⑤</sup>。細分之下，組織結構由無數細節所組成，這也代表着政黨要作出改變的時候，其實有很多的細節可以變動。有一點值得強調，在不少有關政黨變革的文獻中，很多時候都會將政黨領袖的轉變看作政黨變革的原因之一<sup>⑥</sup>；然而這忽略了政黨領袖轉變本身所包含的改革意涵。因此，本文以為政黨領袖的轉變亦屬於政黨變革的其中一種內容，隸屬於組織架構轉變一類之下。

另一方面，政黨亦可以就議題或政綱的立場作出調整。無可否認，每個政黨都有既定的意識形態立場<sup>⑦</sup>，政黨對政綱的編寫亦應該從意識形態的立場延伸開去，它規範了政黨在議題立場上的空間。但在各種議題以及具體政策立場和執行方法上，還是有一定的彈性，容許政黨作出調整。一般而言，在組織架構的轉變或政綱和議題立場的轉變兩種可能之中，政黨都更傾向前者，因為後者的轉變空間本來就不及前者來得大；同時，如果立場轉變過於激烈，動搖政黨固有的意識形態，亦可能導致政黨失去原有的支持者。

在台灣，亦有政黨在選舉落敗之後作出變革以回應外界批評，當中包括在議題立場上有所轉變<sup>⑧</sup>。最明顯的例子是2008年的民進黨，當時民進黨經歷了陳水扁的貪污風波，引發了長達一年的「百萬人民倒扁運動」，對該黨構成重大衝擊，接連在2008及2012年大選中落敗，特別是2008年立委選舉中只取得27席，是2008年立委席次減半以來該黨取得議席的最低點，政黨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危機，同時黨內亦認定與社會運動失去連結是其落敗的原因之一。以上例子充分說明民進黨出現了不同的誘因去推動改革。

當時民進黨處於「百廢待舉」的狀態，黨內亦廣泛討論改革的可能，希望一洗頹風。2008年，民進黨於1月立委選舉落敗，黨主席陳水扁問責下台，由謝長廷上任；但謝長廷在3月的大選中落敗，並同樣因為選舉失利而下台。5月，民進黨進行第十二屆黨主席選舉，辜寬敏、蔡同榮及蔡英文三人參選，最後蔡英文成功當選。民進黨迎來新的領袖無疑是該黨的一大轉變。因為蔡英文與過去民進黨的其他領袖不同，她沒有傳統民進黨的派系背景，在政府出任過大陸委員會主委、行政院副院長等職務，技術官僚背景突出，是當時深受貪污醜聞困擾的民進黨所需要的新人。因此，蔡英文當上黨主席，是民進黨進行改革的第一步。



蔡英文當選民進黨主席後，坊間開始出現各種各樣的改革建議，引起各界猜測，最極端的例子包括當時有說法認為民進黨應該趁機更改黨名為「社會民主黨」，以此重新與社會大眾和社會運動建立更緊密的關係<sup>⑨</sup>。相關提議最後當然沒有實現，但蔡英文亦有公開對此建議作出回應。從這件事上反映出兩個重點：第一，民進黨在當年敗選之後確實陷於困境，努力以不同方法走出陳水扁貪污案以及選舉大敗的陰霾；第二，民進黨在八年執政之後，與本來關係相對緊密的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出現斷裂，因此在改革的方向上不得不聚焦於如何與公民社會重新連結。在蔡英文擔任黨主席不久之後，2008年11月台灣就爆發反對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的「野草莓運動」，當時學生在自由廣場集會，民進黨以激烈行動積極主動配合，只是並未受到社會運動參與者的歡迎，反而令運動參與者更小心謹慎，與民進黨保持距離。而在該運動之後，蔡英文和民進黨也不斷調整針對社會運動的策略，當中包括在黨中央重新設立「社會運動部」（前社會發展部）、稱2009年為「社會運動年」，等等<sup>⑩</sup>。

2012年，民進黨再次在大選中落敗，但無論是與國民黨候選人的總得票差距（這次只輸80萬票左右），抑或是在立法院取得的席次（40席），已較2008年（輸逾220萬票，立委取得27席）大幅改善。而在落敗之後，蔡英文雖然問責辭任黨主席一職，但相關改革並沒有因此停步。蔡英文離開黨中央之後，在2012年7月成立了財團法人小英教育基金會（下稱「小英基金會」），並招攬了不少活躍於社會運動的大學生加入。小英基金會表面上不是民進黨的直接組織，但兩者之間關係不言而喻；其缺少民進黨的直屬關係也減輕了年輕社會運動參與者的抗拒，有助拉近民進黨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到2014年，民進黨黨內進行換屆選舉，蔡英文再次當選黨主席，當時台灣剛經歷「太陽花運動」，民進黨與社會運動之間的聯繫雖然不算直接，但與六年前野草莓運動時相比，彼此之間的關係已大幅改善。而蔡英文在小英基金會的工作，也讓她得以建立俗稱「英系」的網絡，對她以後在選舉、黨領導，以至執政，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幫助。

以上簡單回顧民進黨在2008年選舉大敗之後推行的改革，旨在說明政黨在偏離了最大目標後，亟需通過不同的變革，以求重新調整發展方向，改善日後選舉中的成績。但政黨面對敗選，不一定會作出改變，而即使進行變革，也並不保證改革有效。像蔡英文擔任民進黨主席的初期，過份投入參與社會運動，反而一度換來更負面的形象（被形容為「暴力小英」），與改革的目標愈走愈遠。

### 三 國民黨在2016年以後對敗選的不同反應

民進黨在2008年選舉大敗，謝長廷與馬英九的得票差距超過220萬票（16%），加上在立法院中失去大量議席，形勢陷於水深火熱。在馬英九的八年

執政之後，「風水輪流轉」，國民黨陷入相似的困境之中，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2016年大選前，國民黨發生更換候選人的風波，在首先提名洪秀柱出選之後改為徵召朱立倫上陣，最終在選舉中以308萬票（25%）的差距落敗；到了2020年大選，國民黨再次落敗，與民進黨的差距亦有近265萬票（18%）。接連兩次選舉大敗，對國民黨來說也是促成政黨變革的「好的原因」。那麼國民黨是否有汲取落敗經驗，找到政黨改革的良方？

如前所述，政黨變革本身有無數的方法和可能，並無指定的「藥方」解決政黨問題，但在芸芸方法之中，黨主席人選的變換，無疑是其中一種最直接和有影響力的方法。新任的政黨領袖是原有人馬還是來自新的派系，將很大程度代表政黨未來是依循原有路線，還是破舊立新。在2016年選舉失利之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引咎辭職，及後舉行黨主席補選，由洪秀柱當選，在餘下約一年的任期擔任黨主席。

洪秀柱是國民黨內資深黨員，在政治立場上屬深藍的「統派」陣營，積極推動「終極統一」及「一中同表」的立場。相較於維持台海現狀、立場相對模糊的「九二共識」，洪秀柱被認為是更類近新黨的立場。這與馬英九、朱立倫等主張「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支持者有所不同。因此，洪秀柱當選有一定的改革或開展新路線的意味。然而，洪秀柱的「統派」路線是否對國民黨在選舉中落敗有對症下藥的作用，則有不少的疑問。

「統派」路線在國民黨內本來就非主流，而洪秀柱與國民黨的關係也因為上述的換人事件而一度顯得尷尬。洪秀柱當選國民黨主席之後，外界就有所謂「國民黨新黨化」的聲音。2016年大選中國民黨落敗，主因在於馬英九的第二任期經歷了台灣民主化以後最大型的社會運動——太陽花運動，持續二十三日的佔領立法院運動對馬英九政府的管治構成直接的負面影響。而該運動最終成功擱置《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服貿）的審議和通過，意味着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的重大勝利，而落敗的一方無疑是國民黨和馬英九。

在馬英九執政期間，台灣的社會運動愈益活躍，從起始的野草莓運動，到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再到2014年太陽花運動這一高峰，這些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和聲量都與日俱增。而無可否認的是運動背後一直都有「反中」的元素。野草莓運動的實際訴求，是抗議政府侵犯人權及推動《集會遊行法》的修改，但事件起因是陳雲林的到訪；至於反媒體壟斷運動，在維護台灣新聞自由的背後，是有關親中集團旺旺中時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及壟斷。到後來太陽花運動的反服貿訴求則是最直接地表達對中國大陸影響力的抗拒。因此，在這股社運風潮之下，國民黨在2016年大選落敗後以洪秀柱的「統派」路線為改革方向，似乎是背道而馳。

即使洪秀柱當選黨主席代表國民黨出現變革的可能性，但這次改變也是短暫的。洪秀柱的補選任期只有一年左右，到2017年黨主席換屆，洪秀柱亦有再次參選，但敗給另一參選人吳敦義。吳敦義的當選意味着國民黨重新回歸馬英九任內的路線，因為吳敦義曾經出任馬英九政府的行政院長（2009-

2012)，也是馬英九第二個任期時的副總統(2012-2016)。因此，吳敦義接掌國民黨，沿政黨舊有路線的取態明顯不過，亦代表政黨變革的過程在主席人選這一環止步。

吳敦義帶領的國民黨亦曾經作出政黨變革的嘗試，無獨有偶，跟2008年的民進黨一樣，希望重建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然而，這一轉變是否有效針對國民黨在2016年大選落敗，仍然有很大的疑問。民進黨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與社會運動有着緊密聯繫，由黨外運動開始到2000年執政以前，「反國民黨」都成為兩者之間高度重疊的目標<sup>①</sup>。只是民進黨的首次執政在未能控制立法院的情況之下，與社會運動漸行漸遠<sup>②</sup>。因此，民進黨在2008年敗選之後銳意重建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並非無的放矢。

而在吳敦義當選國民黨主席之後的2017年8月第二十屆第一次全代會上，時任國民黨副主席兼秘書長曾永權提出「支援社會運動，對抗不公不義」，並表示<sup>③</sup>：

123年之前，本黨為了推翻不公不義的腐敗政府，伸張人民正義而成立，先賢先烈為此拋頭顱、灑熱血。一百多年以後的今天，本黨想要重返執政，更是必須堅持理想，我們絕對會在各個層面上支持所有為了反抗不公不義而努力的團體，讓台灣社會更美好，善盡在野黨監督執政黨的責任。

從以上的講話中就可以見到，國民黨與台灣社會運動的關係非常薄弱，當中提及的「123年之前」指的是國民黨前身興中會在晚清時的革命，跟現代台灣政治中的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其實並無關係。當國民黨提出「支援社會運動」之後，確實在一些反對民進黨的抗爭運動中看到國民黨的身影。民進黨在2016年執政後不久，推行了修正《勞動基準法》的「一例一休」政策以及年金改革，期間引起了民間不少反對聲音，特別是軍公教(軍隊、公務員、教師)團體進行的抗議，國民黨都有參與當中。但歸根結底，國民黨相關的政黨變革方向，雖然在表面上與民進黨當年重新連結社會運動的方向吻合，但國民黨的嘗試似乎未能引起太大共鳴，因為這些反政府運動的組織和團體(軍公教團體)，本來就與國民黨密不可分，這樣的「連結」並沒有增加選民和公民社會支持，國民黨欲與社會運動連結的政黨變革方向也難言有效。

在吳敦義擔任黨主席期間，國民黨在2018年的「九合一」地方選舉得到勝利，其中最令人意外的是韓國瑜在高雄贏得市長一職，牽起一股「韓流」。在備戰2020年大選時，吳敦義表態不會親自參選，同時開始黨內初選程序，並以民調結果作為初選方法，最終韓國瑜成為候選人。在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沒多久，便於2019年3月高調訪問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又在訪港期間拜會中聯辦<sup>④</sup>。這些舉動當然顯示出國民黨得到北京的重視，呈現出國民黨與民進黨之別。但在同一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受全球各地廣泛關注，

韓國瑜在翌年競選時也需要向選民再三表明反對「一國兩制」的立場<sup>⑤</sup>。而作為對手的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亦高調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當聲援香港、反對「一國兩制」成為了藍綠兩黨在競選時高舉的議題，一直以來持「反中」立場的民進黨在這方面自然比忽爾改變立場的國民黨來得更具有說服力。因此，韓國瑜未能挾着最初在高雄牽起的「韓流」拯救國民黨，國民黨再次在大選中落敗。

跟2016年朱立倫辭任國民黨主席的情況一樣，吳敦義同樣問責辭任黨主席。連續兩屆大選大敗，國民黨需要改革的聲音此起彼落。在2020年的黨主席補選中，由郝龍彬、江啟臣爭逐。郝龍彬曾任國民黨副主席和兩屆台北市長，是黨內重要人物；而學者出身的江啟臣，當時年僅四十八歲，屬於黨內新生代人物。最後江啟臣勝出，成為歷來最年輕的黨主席。江啟臣的當選反映出黨內對政黨改革的盼望。而他亦不負眾望，在上任初期就帶來了重大的改革方向，那就是對「九二共識」立場的檢討。江啟臣在2020年3月上任，6月，國民黨改革委員會提出「堅持中華民國主權、保障自由民主人權、維護台灣安全優先、創造雙贏共享繁榮」，探討以「四大支柱」取代「九二共識」的可能<sup>⑥</sup>。惟最終因為黨內強烈的反對聲音，相關討論無疾而終。

跟2016年敗選之後走馬上任的洪秀柱一樣，江啟臣在擔任國民黨主席大約一年多之後，就需要面對新一屆黨主席選舉，跟洪秀柱一樣，江啟臣競逐連任失敗，由曾經在2015至2016年擔任黨主席的朱立倫再次上任。雖然江啟臣所代表的改革方向與洪秀柱截然不同，但兩人相對鮮明的新路線，都代表着國民黨變革的可能，然而最終都無法得到充足的時間和機會付諸實踐。朱立倫重新鞏固了國民黨在兩岸政策的立場，而此後亦沒有更多關於「九二共識」的討論。

## 四 國民黨改革欠奉的原因及後果分析

相比起民進黨在2008年選舉落敗之後實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國民黨在敗選之後只有零星的改革嘗試。而國民黨兩次落敗後都迎來了與傳統路線有別的人選擔任黨主席，洪秀柱和江啟臣分別代表了兩種改革方向，一是走向深藍「統派」，一是走向台灣本土意識，但最終都敵不過黨內元老的原有方向，兩次短暫的變革都停留在「只聞樓梯響」的階段，很快就由代表原來勢力的吳敦義及朱立倫回朝領導國民黨。

對於國民黨來說，近屆大選失利的一大原因是其兩岸立場無法得到多數選民的認同，因此國民黨在兩次落敗之後的變革嘗試正在於對兩岸關係的闡述有所調整。但國民黨始終不願意改變現有立場，無論是更進一步走向「統派」，或是放棄對「九二共識」的堅持，都無法成為黨內的主流。走向「統派」，只會令國民黨跟台灣的民意主流愈走愈遠；但走向本土化、放棄「九二共識」，



國民黨又難以形成新的兩岸論述，遂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而即使國民黨繼續站穩現有立場，繼續高舉「九二共識」，其實也是困難重重。

國民黨的兩岸政策以「九二共識」為基礎，將重點放在「一中各表」的論述，同時亦高調反對「一國兩制」，無論是朱立倫當選黨主席之後，或侯友宜在2024年大選中都多次強調<sup>⑩</sup>。另一邊廂，北京同樣堅持「九二共識」，但重點則放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解釋之中，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在2019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的講話中，重申以「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主張<sup>⑪</sup>。因此，國民黨一方面高舉「九二共識」、另一方面反對「一國兩制」的立場，其實既不被北京接受，也早已被選民投下不信任票。

國民黨在2024年大選中再次落敗，但因為柯文哲的參選，使得藍綠兩黨之間的得票距離大幅收窄，加上國民黨在立法院成為最大政黨，讓它在自身表現實際上沒有太多進步的這場選舉中彷彿迎來勝利。與2016和2020年的敗選不一樣，黨主席朱立倫並沒有下台，意味着國民黨將不會再次出現短暫的改革，也沒有急切和「好的原因」去推動政黨變革。但現實中，國民黨的形勢是否真的已經扭轉、再無變革的需要？還是這次表面上的選舉勝利，掩蓋了國民黨的真實問題？當國民黨無法通過有效的變革、提出具說服力的兩岸關係論述，重新贏回昔日支持馬英九的選民，便難以重現以往的風光。過去兩屆大選落敗之後，即使改革無法收效，但國民黨至少有作出改革的嘗試；2024年大選之後的國民黨原地踏步，政黨的前途實在堪慮。

## 五 總結

本文嘗試以「政黨變革」的角度，分析國民黨在馬英九卸任後所經歷的兩場大選敗仗之後的反應。如同一般民主政黨一樣，國民黨在敗選後不得不作出回應，通過改革來重新達到贏取選票、贏取議席等目標。2016和2020年，國民黨都在黨主席的補選中選出一位清楚代表改革方向的人物，以求帶領國民黨進行改革，但兩次都是失敗收場，補選的兩位黨主席在短短一年多的任期中沒有留下甚麼實際改變，就由屬於原有路線的政黨人物重新擔任黨主席，並且再一次在沒有推動實質改革的情況下，在下一屆大選中落敗。到了2024年，因為柯文哲的參選，國民黨免去「需要改革」和「嘗試改革」的壓力，在大選後繼續原有路線。

國民黨始終維持原狀、缺乏有效的改革，其中一大原因在於其對最重要的範疇——兩岸立場——並無空間作出調整。國民黨既要平衡民意，亦需要兼顧可行程度以及北京的反應，在重重限制之下，即使保持原有支持「九二共識」、反對「一國兩制」的立場，實際上也幾乎沒有調整的空間。這既顯示出國民黨在兩岸立場上的困境，同時顯示出現有立場依然是國民黨的致命傷，意味着該黨難以突破大選的局限、重回馬英九時期取得過半數選民支持的日子了。

### 註釋

- ① Robert Harmel and Lars Svåsand, "Preface", *Party Politics* 3, issue 3 (1997): 291-92.
- ② Robert Harmel and Kenneth Janda,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6, issue 3 (1994): 259-87; Kenneth Janda et al., "Changes in Party Identity: Evidence from Party Manifestos", *Party Politics* 1, no. 2 (1995): 171-96.
- ③ Robert Harmel and Kenneth Janda,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 259-87.
- ④ Robert Harmel and Lars Svåsand, "The Influence of New Parties on Old Parties' Platforms: The Cases of the Progress Parties and Conservative Parties of Denmark and Norway", *Party Politics* 3, no. 3 (1997): 315-40.
- ⑤ Robert Harmel et al., "Performance, Leadership, Factions and Party Change: An Empirical Analysi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8, no. 1 (1995): 1-33.
- ⑥ Daniel Stevens, Jeffrey A. Karp, and Robert Hodgson, "Party Leaders as Movers and Shakers in British Campaigns? Results from the 2010 Election", *Journal of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and Parties* 21, issue 2 (2011): 125-45.
- ⑦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trans. Barbara and Robert North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9).
- ⑧ Dafydd Fell,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Party Change in Taiwan: 1991-2004",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5, no. 1 (2005): 105-33; *Party Politics in Taiwan: Party Change and the Democratic Evolution of Taiwan, 1991-2004* (London: Routledge, 2005).
- ⑨ 楊金城：〈有人建議改名「社會民主黨」 蔡英文：改黨名 須有共識〉(2008年7月7日)，《自由時報》網，<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225288>。
- ⑩ 〈蔡主席：新的一年，民進黨會以實際行動承擔保護台灣的重責大任〉(2009年1月1日)，民主進步黨網，[www.dpp.org.tw/media/contents/2730](http://www.dpp.org.tw/media/contents/2730)。
- ⑪ Shelly Rigger, *From Opposition to Power: Taiwa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1).
- ⑫ Ming-sho Ho, "The Resurgence of Social Movement under the Ma Ying-jeou Government: A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erspective", in *Political Changes in Taiwan under Ma Ying-jeou: Partisan Conflict, Policy Choices, External Constraints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ed. Jean-Pierre Cabestan and Jacques deLisle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00-19.
- ⑬ 〈第20屆全代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提出黨務報告〉(2017年8月20日)，中國國民黨網，[www.kmt.org.tw/2017/08/20\\_19.html](http://www.kmt.org.tw/2017/08/20_19.html)。
- ⑭ 李宗憲：〈韓國瑜訪港澳會晤中聯辦官員背後的政治考量〉(2019年3月25日)，BBC中文網，[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7684409](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7684409)。
- ⑮ 游凱翔：〈韓國瑜提三個絕對不改變 反對一國兩制〉(2019年11月29日)，中央通訊社網，[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11290116.aspx](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11290116.aspx)。
- ⑯ 施曉光：〈大老不開心 江啟臣重抱九二共識〉(2020年9月6日)，《自由時報》網，<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397891>。
- ⑰ 羅浚濱：〈朱立倫：反對台獨和一國兩制 依慣例賀電中共二十大〉(2022年10月17日)，中時新聞網，[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1017003454-260407?chdtv](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1017003454-260407?chdtv)。
- ⑱ 〈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2019年1月2日)，共產黨新聞網，<https://cpc.people.com.cn/BIG5/n1/2019/0102/c64094-30499664.html>。